

第一章 爱智之旅

哲学之思的契机，是为浑沌的事和物的神奇魅力所激起创造意识的萌发，以及对于不可知的人生与社会的忧患意识所兴起终极关切的冲动。前者使人理智地沉思，后者使人情感地反省；前者“人之思”是以客体自然宇宙为对象，后者“人之省”虽也以客体社会为对象，但以自省自我身心为重要内涵；前者以追究终极真理为标的，后者以体认价值理想为目标。大体而言，西方传统哲学侧重于前者，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于后者，现代中国哲学则试图在两者的冲突融合的智能创造中，来建构新哲学、新思维、新体系的和合体。

无论是“哲学起源于知识的惊诧”还是源于忧患的活水，他们都在求索一定之道。尽管道的内涵殊异，但天下的大势，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中国自清以来，在“大一统”和独尊程朱理学的情境下，哲学的厄运愈来愈深，不能解脱，以至于现代。假如说“其他一切科学都不停在发展，而偏偏自命为智慧的化身，人人都来求教的这门学问却老是原地踏步不前，这似乎有些不近情理”，那么，如何改变，怎样转换这种“不近情理”，两个多世纪以来，东西哲学家都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7。

做出了呕心沥血的探索。尽管如此，中国哲学却一直在这种“不近情理”的阴影里过活。

三大思辨的和合解构

笔者于 1988 年提出和合学思想^①到 1995 年完成了两卷本《和合学概论》的撰写^②。其间大化流行‘以此观照’在途中’的和合学，如何从文化战略构想提升到哲学理论思维道体，使和合学成为真正的爱智哲学，就必须用和合学方法澄清传统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在解题方案上有创造性突破，以此体现和合学方法的殊胜效能。另外用哲学的“爱智约定”反观和合思想及其方法的内在建构问题，力求在超越层面找到生生道体的归宿，使和合价值道体在理论思维世界得以呈现。换言之，前者是对传统哲学的和合批判，以彰显和合学方法的创造性能为目标；后者是对和合思想及其方法的哲学批判，以崭露和合生生道体的爱智品格为宗旨。哲学的意蕴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心灵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即理论化、概念化体系是指对“是”（认知向度）与“好”（价值向度）张力诠释的思考。和合哲学就是对此逻辑体系思考的思考。和合哲学创造性主旨和形态是生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哲学是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学说即‘生生哲学’^③。这也是对于哲学这门学问‘老是原地踏步不前’的化解和‘不近情理’的冲决。

参见拙著：《新人学导论》第 211—219 页 北京 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 年 6 月版。该书第五章第二节《和合型与完美型—合一的氛围》，就“和合”作了论述。

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第 90 页。

现代西方各哲学学派拒斥形上学本体论的结果是：从谓词逻辑的后门逐出，又从模态逻辑的前门引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形上学本体论是任何逻辑系统建构的基础性元理论。从逻辑上讲，单一论的困境是如何分化变现形上学本体，使其能圆融地说明世界的多样性；多元论的困境是怎样将一系列形上学本体元整合为一个系统，使其能完满地解释世界的统一性。从现代逻辑角度来看，前者可称为直觉主义或构造主义，如自然数皮亚诺系统的构造和自然数的空集递归构造；后者可称为形式主义或演绎主义，如数理逻辑的罗素-怀特海系统，几何的希尔伯特系统。若按中国的哲学思维，两者并非只有冲突，而无融合，非此即彼，而是互动互补，可以融突而和合为新理论思维形态。

（一）人文价值时间的和合品格

要使和合哲学体系耸立于人文精神世界，必须对以往哲学文化中的“古今之变”、“中西之争”、“象理之辨”这三大思辨进行和合解构。这是因为这三大思辨是围绕着人文价值时间、全球生存空间和精神活动逻辑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理论思辨。它们彼此缠结，根深蒂固，遮蔽了人文精神世界的和合本真及其和乐意境。为了适应建构和合哲学体系的需要，必须勘测出坚如磐石的地基，并清除和改造一些碎石瓦砾，这是建构的前期准备，其目的在于彰显和合效用历史、和合价值式能、和合语言存相及和艺术功德的本真面目与原初形态。

人文价值时间的和合品格旨在化解传统“古今之变”的片面化执著。自先秦延续到现代的“古今之变”始终没有达到太史公司司马迁所提出的“通”的和合目标，一直存在着对人文价值及其时间进程的片面化理解。盲目“崇古”或是一味“是今”以及“古为今用”都是以二分古今、遗忘未来作为“前识”的。以古为古、以

今为今 古今彼此对立 相互外在 支离和合时间的三维序态（即往古、现今和将来），剖分其二，遗忘其一，凑成所谓的“古今辩证法”是传统“古今之变”的思维运思的基本方法 亦是传统形而上学所导致的二分思维方式。

往古、现今和未来三维序态互动互补 既冲突 又融合 构成纵向时间链。这是因为时间就其本质而言是大化流行的。过去的遗传、积累至现今 现今的肩负、蕴涵着往古 而又孕育、化生着未来。宇宙万物 人类社会 概莫能外。“数往者顺 知来者逆”。人文精神及其价值创造中的时间，不是“斗转星移”的天文学时间，也不是“电闪雷鸣”的物理学时间 而是“自强不息”的人文学时间；“革故鼎新”的价值学时间。前两种时间是非生命的、无智能的实在性时间，严格服从相对论和量子学所揭示的有关变换法则；后两种时间是生命体的、智能化的主体性时间，遵循“大易之道”所拟议的阴阳卦变模式。前者是天道大化流行的演变方式，是自然给予的；后者则是人道参赞化育的日新节律，是文化创造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历法编制技术的遮蔽性影响，人们误将天文物理时间看做人文价值时间 以至于“治历 而不‘明时’”。时间的天人差分与人文和合被反复遮蔽 迄今处于郁而不发 暗而不明之中。

人类远在历法尚未产生、结绳记事的时代 即当中国在伏羲之时，人文精神刚刚从动物无意识水平中苏醒起来时，先民们已经感悟到人文价值时间的逆转性及其和合性。在意向化的人文价值时间长河里，既往之事依序冻结在记忆的此岸，像绳索上已打好的纽扣一样历历在目；现在之事处于繁忙之中，像正在打结的绳索一样令人费心；将来之事渐渐呈现其端倪，通过面向未来的筹划越出精神世界的地平线，提前到达生活实践境域，像待打纽扣的绳索一样舒展在手上。原始人一条用于记事的绳索，已经形象化地将人文价值时间全序化地展现出来。按照这条人文价值化的时间绳索，

欲叙说往事，追溯的思绪可按由近及远的顺序，由手上的纽结往上计数并同时激活记忆冰层 缅怀往事本原 欲瞻望将来 联想的翅膀可沿着见微知著的线索，由手上的纽结往下推寻，并同时激发想像浮点，深达来者根据。当先民们依记事绳索“数往”或“知来”时，人文精神世界的价值时间，始终与物理事实世界的天文时间彼此逆向 所以“易逆数也”。“数往”则逆向“原始”；“知来”则逆向“反终”两者均以上手的现在为计数或筹划的“时间始基”。天文物理时间与人文价值时间的逆向关系：可以两者时间的“现在态”或“现今态”的“人生此在”为坐标 天文物理时间是“数往”者“顺溯” 人文价值时间为“知来”者“逆料”。

时间序列的天人分道与逆向对称 是人文价值创造及其时间和合本质的自然前提。天人时间分道，使人类有了驾驭天文物理时间、并独立从事智能创造的无限可能性 天人时序逆向对称 更使人类有能力打通时间隧道、并相继完成前人未竟的价值创造大业，运用非生物本能的人文手段积累经验知识，使人文精神世界不断继续开来，走向繁荣和辉煌。正是因为天文和人文是在相反的时间序列中演进的 因此才能不断发生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时间革命。

若依据大易原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时间革命 其发生的双重机制是“水火相息 二女同居 其志不相得。”^①在天人之际，当天文之水要熄灭人文之火时，或者当人文之火要烘干天文之水时，天人之际将发生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在人文内部，当“数往”与“知来”过分亢进或过分抑郁时，人文内部将发生政治革命或思维革命。

此两类时间革命的使命在于 依天道运行编制历法 为人道创业昌明时序。历法是天文物理时间的阴阳编码，四时更替按六十

《革·彖传》，《周易本义》卷二第 43 页 世界书局，1936。

甲子分级循环。人事活动依照阴阳和合历法的编码表有序进行，通过参赞天地之化育而开创人文价值时间。与天文物理时间相比，人文价值时间具有以下独特性质：

第一 人文价值时间具有‘原始反终’的超循环结构。人文创造活动及其价值影响都是有始有终的人为事业，有其发生、发展和退化的过程和必然被不断超越的命运，而天文物理时间则是无始无终的永恒流逝。

第二 人文价值时间的三维序态同时到场，簇拥着人生此在全时序地呈现其奋斗历程和生命意义。由既往事迹冻结的往古时态通过记忆方式滞留在场，人生参赞化育的现今时态通过操劳方式显著占场，筹划美好前景的将来时态通过想像方式先行到场，想像空间越大，即虚拟性空间越大，将来时态的前景越美好。三维时态和合会聚，同时集结现场，使人文精神世界具有当下即是和瞬间即永恒的全序特征（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是对人文价值时间全序化特征的宗教悟解），而天文物理时间则是偏序性的，过去态和未来态均不在场，在场的只有现在态。

第三 人文价值时间具有‘无中生有’的创造性间断。通过开辟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人文价值时钟更新换代，出现以往未曾有的运作频率和生活节奏。时钟革故鼎新之际，人文形态发生突变，价值尺度产生转换，精神世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存方式、意义标准和自由维度。例如农耕文化形态与工商文化形态，道德价值中心与功利价值中心，其所在的人文精神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频率和生活节奏。换言之，没有创造性间断，人文价值时间就会产生滞胀现象，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同一文化形态和同一价值中心里流连忘返，生命智慧及其创造潜能会因此陷入郁而不发的“明夷”困境。与此相反，天文物理时间不具有创造性间断，总是在量子化水平上连续不断地延续。

凡此种种，人文精神世界的和合时间是从天文物理时间中差分与超越出来的人文价值时间，并且通过不断的历法变革与天文物理时间保持和合谐振。但由历法标志的时间仅仅是人文的“天时”只能对和合生存世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活动起外在性的和形式化的约束作用。譬如现代高科技通过对和合世界的逻辑显相和智能创造可在严冬季节种植蔬菜在酷暑季节制造冰霜。人文价值时间有不同于“天时”的人化品格，其终始和合循环、三维和合在场以及创造和合跃进等特征，正是时间和合本质的人文绽出和价值测度。传统“古今之变”之所以千年阻塞不“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固执人文价值时间内的两段碎片或两个截面，按照“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天文物理时间来辩证求通，结果只能是日趋穷途末路，并不断煽动古今大战。譬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均属古今之间爆发的文化恶战，致使传统文化遍体鳞伤，几乎灭绝，民族精神几度窒息。

（二）生存活动空间的和合通识

人文价值时间的往古、现今、将来三态的互动互补，融突和合，大体可称之为“纵向维度”的时态，这便是“古今”之所以可能平等对话、同情理解的所以然之故。生存活动空间的中西文化的互动互补，融突和合，大体可名之为“横向维度”的空态，这便是“中西”之所以可能平等交往、参赞化育的所以然之故。人文价值时间的“纵向维度”的时态与人文价值空间的“横向维度”的空态，在一定的因缘下融突和合，而为人文价值时空态。

生存活动空间的和合通识，旨在化解近世“中西之争”的局域化偏狭。近世的“中西之争”是古代“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的历史延续和范围扩展。它们都以地方本位主义和文明中心假说作为论争的信念支柱，都带有明显的局域化偏激情感和狭隘意识，

缺少全球和合化、人类同根生的和合通讯。

华夏农耕生产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孕育成熟，并很快进入“郁郁乎文哉”的文明阶段。相反，与中原毗邻的周边地区长期处于以游牧或狩猎为主的“野蛮”状态。因此，从汤武革命到满清入关，华夏文明及其农耕文化始终蒙受“蛮夷”侵扰和游牧掠夺。西欧在中世纪一千年里，也多次遭受北方蛮族的入侵和洗劫，中西文化在上古、中古时期的际遇，有很多相通之处。古代的“华夷之辨”以及相关的“王霸之辩”，曲折地反映了农耕生存方式与游牧生存方式争夺发展空间，华夏礼乐“王道”与蛮夷征伐“霸道”较量智慧谋略的历史过程。

按照一般的说法，农耕方式高于游牧方式，礼乐“王道”优于征伐“霸道”。但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来看，游牧生存方式及其征伐“霸道”近乎阳刚雄健的“乾道”，其势能远远胜于农耕生存方式及其礼乐“王道”。蛮族一旦形成军事联盟，产生天才首领，如成吉思汗等，就如“飞龙在天”，势如破竹，横扫中原，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礼崩乐坏”，家破人亡，国家破碎，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曾死守礼乐“王道”，农耕文化饱经岁月沧桑，犹如阴柔雌顺的“坤道”，尽管最后多能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医治游牧侵扰和“霸道”征伐的满目疮痍，融合戎狄蛮夷，但毕竟过于狷介，缺少“自强不息”的狂者进取精神。满清皇帝雍正与儒生吕留良有关夷夏的争辩说明，天下的生存空间没有固定的归属和主权，按照“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游戏规则，谁能征伐天意，买通人心，谁就是暂时的赢家，这便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规则，胜者就可以随顺自己的意愿而“制礼作乐”，歌舞升平。

依据后天卦序“帝出乎震”；“战乎乾”构成雷天《大壮》(䷗)之态势。刚强以动，锐不可当。虽说“征凶”“小人用壮”，但毕竟“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因此，狂者进取而强

行征伐“霸道”先发制人，正是以无情的烧杀抢掠体现天地化育的正大之情。所以“君子用罔”，无能制止。帝“齐乎巽”；“致役乎坤”构成风行地上观 ䷓ 的景观，柔顺而逊，厚不可测。因此，狷者有所不为而弱守礼乐王道，后发化人，正是以“有孚”的神道设教掩饰汤武革命的暴力之智。所以要“观我生，观民也”，以民情为价值标准。

由此可见，古代的“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辩”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域和宗法伦理，看不到覆盖华夏与四夷的东亚都是黄色人种的生息领地，以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看不到涵摄“王道”与“霸道”的融突大道就是乾坤和合之道，以至“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群龙争战于广阔的原野，同室操戈，两败俱伤，文武张弛于仁义道德，分合振荡，融突絪縕，治乱循环。中华生命智慧不断虚耗，“龙的传人”成为“东亚病夫”。

如果说上千年的“华夷之辨”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华夏文明中心和礼乐“王道”正统，那么，近百年的“中西之争”已经彻底冲决了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无情破灭了“礼仪之邦”的天朝神话。

近世的“中西之争”实质上是东亚农耕生存方式与西欧工商生存方式、儒教伦理道德传统与新教伦理道德传统在中国疆域里的短兵相接。经过百余年的殊死较量，中方被迫节节后退，废除帝制，开放门户，强制工商化，打倒“孔家店”，西方步步为营，设立租界，输出资本，推行欧美化，吸纳新教徒。无情的事实业已证明，华夏不是世界文明的地理中心而被偏离化，儒教不是人类文化的道德正统而被边缘化。华夏文明只是发育在黄河流域，推广到长江流域以及东亚和南亚部分地区的农业文明，随着耕地的不断贫瘠和生活的趋于奢侈，华夏农业文明日益衰落，无力经受“船坚炮利”的战火考验，儒教文化仅是扎根于宗法伦理，寄生在君主政体

之上的道德文化，随着礼节的日趋繁琐和荣辱的逐渐僵化，儒教伦理文化渐被抛弃，不能容纳“民主科学”的血泪洗礼。因此，向欧美学习工业技术和商务管理，去西洋请教民主理念和科学精神，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华语世界无可奈何的共识。

然而，欧美的工商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地域中心，西方的伦理观念也不是人类文化的道德正统。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大规模掠夺，商业化对精神生活环境的深层次侵蚀，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独断专行，科学化衍生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无情蔑视。这些迹象表明，欧美工商文明决不是世界文明的惟一价值归属，西方伦理文化亦非人类文化理想的惟一精神家园。

世界文明只有相对性的经纬测度，没有固定的智能中心。各地域的文明如同灿烂的星辰，交相辉映，共同守护着全球生命智慧的无限奥秘。人类文化只有比较级的特征分野，没有绝对化的价值正统。各民族的文化恰似怒放的花卉，争奇斗艳，相与透露出和合精神的澄明意境。近世的“中西之争”之所以偏激而狭隘，除了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和震撼民心的“强国保种”之外，全球一体化意识的无故缺席和人类同根生的情感的麻木不仁，是其最深刻的原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原子能的科学发现、控制技术和军事利用，第一次将全人类的不同种族以及生态圈的芸芸众生逼上新的诺亚方舟，第一次暴露出生命之树的同根性及其生机的偶然性与脆弱性。面对足以将众生连根拔起，使文化毁于一旦，将生命智慧埋葬在无底深渊的原子洪流和中子辐射，人类只能在巡游银河的地球上同舟共济，以和爱之情，和生和处，和立和达。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在地球生态方舟上，不管白种人、黄种人，莫论东半球、西半球，其实都是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

地球人。但因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不同种族定居于一洲之土，不同半球来去在一洋之侧，虽说同是地球人，反而“生小不相识”。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和麦哲伦的环球大航行，是全球化的前奏曲。可是，这些殖民主义探险家见金不见人，并不像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那样乐善好施，因此，地理大发现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的是灭绝人性的死神，环球大航行给亚非有色人种送来的是罪大恶极的战神。新航路开辟后的五百年间，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等等冲突不断升级，并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与此同时，融突也日趋进步，经过五个世纪的融突，和合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旋律与跨世纪的协奏曲。人类在对话与合作中彼此交往相识，终于发现原来大家竟是患难与共、命根相连的“同乡”。

人类在生生活活动空间的和合通识形成之后，“中西之争”已经失去了立论的支柱。现在，我们作为家住亚细亚黄土地、居于太平洋西海岸的中华民族，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展示东亚智慧的“中和”之道和“和乐”之境，同时容摄西方智慧的精微之术和纯粹之理，以和合智慧助燃世界文明火炬，耕耘人类文化之田园，为地球方舟掌舵护航，为人类命根施肥浇水。

（三）人文精神逻辑的和合源泉

在“古今”、“中西”的融突和合的“大视域”里，想像的翅膀自由翱翔，在人文价值的“时态”、“空态”的纵横融突互动互补中，思议的广域开花结果。

人文精神逻辑的和合源泉，旨在梳理古典“象理之辨”的无根化游荡。古典形而上学是一种抑爱崇智的在场形而上学。贬抑爱情欲望及其诗意想像，推崇理智认识及其概念思维，使这种形而上学具有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抽象本质。和合哲学体系须全面启动“和爱”原理，设法激活“象性”范畴，深入探测激情渊源，使其思

想哲学体系成为意境跌宕、引人入胜、想像玄妙、回味无穷的和合精神殿堂。

哲学原是一种追根究底的学问，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一是，从感性呈现的东西通过由表及里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这里所谓由表及里是指由现象到本质、由具体到抽象、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程，最终是以理解的东西，即抽象的、形而上的本质为根底。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基本上是沿着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发展的。

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冲决了传统形而上学从现实具体到抽象永恒的本质的追问方式，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在场的与未出场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东西，并非是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这种追问方式并不是滞留在当下在场东西之中。它也要求超越和追究根源，只不过是从事在场的现实东西超越、追究到不在场的现实东西而已，譬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从显现的东西到隐蔽的东西的追问，即从“有”到“无”的超越。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基本上是沿这种超越、追问的思维模式发展的。

海德格尔认为，“爱智”一词可能是由赫拉克利特制造的，在赫氏看来，“一”就意味着整体，“智”指存在是存在者，即存在集合存在者于其中，以至于它就是存在者。“爱智”之“爱”，就是与“智”协调一致，即与存在合一。智者派把“爱”作为一种对“智”的特殊追求，其追求的问题变成了“什么是存在者”？“爱智”就成为哲学。哲学的最高任务是人与存在合一、协调以及人把存在当做外在之物加以追求。前者是赫氏和巴门尼德的观点；后者由柏拉图实现。海德格尔倡导回到前者，哲学就是与存在者的存在相适应。

但自柏拉图以来 西方形而上学就逐渐开始了“爱”与“智”的二元分裂运动 亦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神学有“爱”无“智”虔诚信仰“上帝”以至达到痴迷的状态 哲学有“智”无“爱”抽象推演“逻辑”几乎接近冷酷无情水准。前苏格拉底的爱智之学 (Philosophy) 逐渐分裂, 嬗变成后苏格拉底的爱神之学 (Theology) 和理智之学 (Metaphysics)。

柏拉图把认识分为想像、信念、理智和理性四个等级 前两个等级属于感觉“意见” 后两个等级属于理念知识“心智”)前者探讨生成变化, 后者探讨存在。后者高于前者, 理性高于想像, 因而在“理想国”里 代表理性、象征智慧的哲学王管理国家 而代表情欲、务必节制的诗人画家只能与农工商为伍, 从事技艺性生产。

人与存在合一 与存在对话 倾听存在言说。奥古斯丁是探索心灵奥秘的大师, 他颠倒了柏拉图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主张信仰先于并高于理性, 批判“理智上的傲慢”。他认为上帝是真理, 也是爱情 爱上帝即是爱“大爱” 人若不爱别人 也不能爱上帝 爱“大爱”。他最后还是将爱情无条件地奉献给了上帝及其永恒之光。在灵魂上升和净化的过程中, 情欲及其印象被连根拔起, 其形而上的神性仅是一缕虚脱的启示灵光。

康德虽然十分重视想像在直观不在场对象方面的能力, 并借助想像力为概念提供“统觉”和“图式”。但在实践领域 康德仍然推崇概念思维, 轻视情感想像。康德本人终身未娶, 过着像机械钟表一样刻板的世俗生活, 以道德力量约束激情, 以理性概念融解想像, 其异化式的人格正是无诗情画意的古典形而上学的真实写照。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体系, 从逻辑上终结了古典的“理智之学”, 理性通过牺牲个性僭越了上帝的名分。黑格尔之后, 叔本华描绘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非理性因素开始步入大雅之堂; 尼采通过重估一切价值, 将爱欲及其想像从埋葬上帝的坟墓里

救出，使人文精神的种子从天堂回归大地。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重新发现了哲学与诗在内在源泉上的神秘亲缘关系。其后，海德格尔通过向人生此在的自由发问，追寻存在的时间意义，第一次使“烦”、“怕”、“畏”等生存情态名正言顺地进入哲学形上学本体论的阐释境域，成为理性超越自身的基础结构和原初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萨特等思想家从文学角度描述存在的个体性、时间性和非理性，使激情、欲望和想像等精神因素从被理智冰封的冻土层下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成为 20 世纪西方科技文明、艺术创作、哲学翻新、文化繁荣的原动力。透视 20 世纪西方哲学文化扑朔迷离的奇异景观和转眼即逝的众多流派，不难看出其中的激情涌运、欲望升华和想像驰骋，而这些正是智能和合创造的源头活水。

当西方哲学重返“澄明之境”，恢复“爱智”权威，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上学本体论在“大地”、“人生此在”和“生活世界”中寻根奠基之时，中国哲学却“抽刀断水”，用简单的“一分为二”的奥卡姆剃刀，拦腰截断了“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的象理和合传统，用写对联的拼凑方式，让“形而上学”不明不白地作了所谓“辩证法”的活靶子和所有哲学迷误的替罪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从此“花果飘零”，只能以“汉学”的知识考古方式寄寓在西方哲学文化的边缘上，以“国故”的文献训诂方式栖息在现代哲学文化的夹缝里，出现了种种“无本体”、“无根基”的游离现象。

中国古典哲学文化以表意语言和象形文字为特殊的符号媒体，“象性”范畴、“实性”范畴和“虚性”范畴两两复合，构成言外有象、象外有意、意外有境的重重无尽、回味无穷的和合精神境界。加上中国哲学家没有选择形式化的公理演绎系统，没有开发抽象化的逻辑思维形式，如名家和墨家的逻辑系统在秦汉以后便式微了，而是借助于《周易》的象、数、理卦爻阴阳变易模型来言志、抒

情和比拟。因此，中国哲学文化象理和合本源没有出现生离死别式的二元分离运动，没有出现像西方哲学文化中理智对想像的拒斥现象。尽管随着时势和际遇的变迁，象理各有阴阳消长、此显彼隐的偏颇。如两汉哲学文化倚重象数，喜欢铺陈堆砌，焦贛的《易林》和司马相如的汉赋为其代表；魏晋哲学文化崇尚义理，嗜好玄远清谈，王弼的《易注》和陶潜的诗歌是其典范。但是，直到新文化运动前夕，象与理没有截然对立的分离现象，至少在文坛以及文献中是如此。例如程朱道学，伊川《易传》穷理不废象，朱子《周易本义》明象不弃理 然而 两者均不杂合情欲和意愿。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神秘感通，象理本源和合，虽具有整体优势 能够实现内在的“纵向超越”和“横向超越”，有资格跨越时空界限而与现代西方哲学交流对话，但毕竟因差分不足而混沌难开。象理显微无间又促使情理难解难分，家国虚假同构，血缘情网恢恢 孝忠治理天下 大公无私而存理灭欲 以理杀人而顽石补情 诸如此类的颠倒梦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竟然是史实。

综上所述，和合哲学体系首先需要为“爱智”正名，还形而上道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超越身世 借鉴当代西方“不在场”(Absence)的形而上学思路，向世人提供和合人文精神及其生命智慧不在以理杀人犯罪现场的确凿证据和有力辩护，护理被伤害的和合世界根基，促使生命智慧“枯杨生稊”，移植生根，嫁接开花，达成对“中西之争”的和合超越，了断民族精神的颠沛劫难和无根飘零。

(四) 和合哲学的奠基

人文精神和合逻辑的本源在象理浑然未分的激情之中。激情是诗意想像、哲思推理的自然智能基础，是和合精神的原初激发状态，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和无穷的可能性。中国古代的气范畴和气

质概念 其生意和动机均在激情深处。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以及“将发”之“机”，也与激情密切相关。无激情作源泉的想像，是干瘪瘪的无意境的空象；无激情作本根的理智，是冷冰冰的不流行的死理。古典“象理之辨”的无根化飘零，在西方表现为“爱”与“智”的生离死别，在中国表现为象理合一的忘情灭欲。和合生生道体要使“爱”“智”团圆，为“象”“理”补情，使人文精神通体和合，生机勃勃。

和合体是从三个维度“和合起来”的：一是通过解构“古今之变”疏明人文价值时间的和合本性，转生传统，将往古、现今、将来和合成一条不断超越的思议升华之路；二是通过解构“中西之争”疏明生存空间的和合特征，融摄全球，使“和立”、“和达”与“和爱”和合成一条不断通达的生命流行之路；三是通过解构“象理之辨”疏明人文精神的和合结构，守护激情之源，搏击想像之翼，使和合之道与和乐之体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切。

和合体三维和合解构与和合三维世界的混沌对应关系大致为：

“古今之变”及其和合解构——和合意义世界及其规矩测度；

“中西之争”及其和合解构——和合生存世界及其智能创造；

“象理之辨”及其和合解构——和合可能世界及其名字拟议。

对古今、中西、象理三大思辨的和合解构，依次清理了文明碎片，种族偏囿和理智傲慢，梳理出人文精神世界的和合价值时间、和合生存空间与和合逻辑本源，为和合哲学体系奠基。

二、中国哲学的创新标志

和合哲学体系尽管“在途中”，但却是“爱智”的结晶，是为了人类和中国超越五大冲突和危机以及中西文化和传统现代冲突所

营造的诺亚方舟，也是为安顿当代高科技的异化和全球化而建构的精神家园。

帕斯卡尔讲过：“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显示了人的尊严与伟大，创新促进了思想的繁荣与发展。中华民族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她为人类文化贡献了老子、孔子、朱子和阳明子等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名家。中国哲学是不断创新的哲学，它为世界哲学增添了《周易》、《论语》、《道德经》和《传习录》等一大批经典的创新力作。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人文学科学者有责任继承中华民族的善思传统，弘扬中国哲学的创新精神，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为世界哲学的发展，谱写更加灿烂的思想篇章。为此目的，需要明确中国哲学不断创新的内在根据和演替脉络。

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汇聚，又是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结晶和凝聚，同时也是思想家主体精神的超越和流行。因此，中国哲学不断创新的内在根据和演替脉络，就逻辑地蕴涵着三个分析维度：

（一）核心话题的转向

思想是精神的言说机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凝聚，哲学思想总是以核心话题（nuclear topic）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并通过核心话题的反复论辩，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核心话题的时代转向，是哲学创新的话语标志。

在西方哲学史上，核心话题有过三次大的转向。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转向，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训谕，打断了自然哲学“万物始基”的科学话题，开启了对“至善”理念的绝对追求。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借助“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冻结了经院哲学有关“上帝本质”的神学话题，开创了对“理性”方法的逻辑批判。